

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 编

中國詩學研究

第
6
輯

中古诗学暨曹道衡先生学术思想

研讨会专辑

安徽人民出版社

中國詩學研究

第⑥輯

中古詩學暨曹道衡先生學術思想

研討會專輯

安徽師範大學中國詩學



安徽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诗学研究. 第6辑, “中古诗学暨曹道衡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专辑/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编. —合肥: 安徽人民出版社, 2007. 7

ISBN 978 - 7 - 212 - 03102 - 2

I. 中… II. 安… III. 古典诗歌—文学研究—学术会议—中国—文集 IV. I207. 22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29178 号

中国诗学研究 第6辑

“中古诗学暨曹道衡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专辑
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 编

出版发行: 安徽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合肥市政务文化新区圣泉路 1118 号出版传媒广场 8 楼

发 行 部: 0551 - 3533258 3533268 3533292 (传真) 邮编: 230071

组 编: 安徽师范大学编辑部 电话: 0553 - 3883578 3883579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制: 安徽芜湖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张: 9.625 字数: 241 千

版 次: 2007 年 9 月第 1 版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212 - 03102 - 2

定 价: 20.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中国诗学研究》

学术顾问：傅璇琮 刘学锴 莫砺锋 钟振振
邓小军

编 委：丁 放 余恕诚 胡传志 潘啸龙
谢昭新 陈文忠 汪裕雄

主 编：丁 放

副 主 编：胡传志 潘啸龙 谢昭新

《中古诗学暨曹道衡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专辑》

本辑执行主编：刘跃进 刘运好

出版说明

曹道衡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古代文学研究专家，中古文学研究成就尤为卓著。为纪念曹道衡先生逝世一周年，进一步深化中古诗学研究，安徽师范大学中国诗学研究中心和文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文学遗产》编辑部联合主办了“中古诗学暨曹道衡先生学术研讨会”，会议于2006年6月下旬在安徽芜湖召开。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等研究机构及全国高等学校专家学者40余人出席了这次盛会。

会议收到论文近40篇，主要探讨中古诗学暨曹道衡先生学术思想，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文学史观念研究；二、诗学理论及体式发展演变研究；三、文学总集编撰方式研究；四、文学史接受与影响研究；五、作家著述及作品个案研究；六、曹道衡先生学术思想、治学方法及其学术成就研究。另收录“曹道衡先生论著目录”。这些论文内容丰富，资料翔实，观点新颖，论证深刻，标志着中古诗学以及曹道衡先生学术思想研究的最新成果。兹选录论文20篇，纪念诗文2篇，另有附录3篇，编为一辑，敬献读者。

另须说明的是，专辑中收录罗国威先生《北京图书馆藏敦煌1543号〈文选·辨亡论〉写卷校证》一文，因研究对象本身的特殊性，无法使用简体字排版，特用繁体字，故与本辑其他文章版式稍有不同，敬请读者见谅。

编者

“中古诗学暨曹道衡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致辞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杨 义

各位专家学者、各位来宾：

早上好。

今天，我们在这里举行学术研讨会，纪念我国著名学者曹道衡先生逝世一周年，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学术活动。我想，最重要的意义就是通过追思和研讨，推进我们对曹道衡先生的学术成就、治学经验、学人风貌和严谨学风的认识和传承。这是一份值得珍视的学术文化财富。

曹道衡先生是我们很熟悉和敬佩的老一辈学者之一。他生于苏州，学于无锡，195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生前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文学所学术委员会委员、《文学评论》副主编、《文学遗产》编委、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中国《文选》学研究会会长、名誉会长等。在长达半个世纪的学术生涯中，曹道衡先生治学严谨、孜孜矻矻，敬始慎终，治学以经史为根柢，用清代朴学途径研究集部。他对十六国和北朝文学的精到的研究，显示了拓荒者的勤勉姿态，使他与沈玉成先生合著的《南北朝文学史》在学术完整性上代表了这段文学史研究的当时最高水平。他著述的《中古文学史论文集》、《中古文学史论文集续编》、《汉魏六朝文学论文集》、《中古文史丛稿》、《南朝文学与北朝文学研究》、《兰陵萧氏与南朝文学》等论著，发表的数百篇学术论文，篇篇都有他的心血，部部都留下他坚实的脚印，赢得了学术界的高度评价。他在先秦两汉魏晋南

北朝文学研究中，把眼光投向文献学、编年学以及地域、民族、宗族、宗教、士风、版本等领域，显示了极高的学养的识力，得出了许多坚实不磨而又发人深省的见解或结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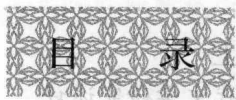
曹道衡先生属于文学研究所元老级的学人，1953年他就作为青年学者进入文学所工作。翌年，《文学遗产》创刊，曹道衡先生又作为编委会秘书参与了《文学遗产》的草创工作。在以后的五十多年间，曹道衡先生始终关注文学研究所的学科发展，始终关注《文学遗产》的学术方向和学术质量，为文学研究所的学科建设，为《文学遗产》的编辑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

我在1990年代初期，由现代文学扩展到古典文学的研究，得益于曹道衡先生和沈玉成先生的指点和鼓励。近年来，我常向曹先生拜年，为他以七十余岁的高龄还每天坚持六个小时以上的研究工作，而且每年都有分量很重的学术著作出版，为他以学术为生命的精神深为感动。他对后辈学者以新思维、新材料、新姿态作出的学术贡献，多有称许，甚至流露出某种钦慕之情，显示了一位学术大家谦虚坦荡的胸怀和与时俱进的活力，都令我感念不已。

主办这次会议的《文学遗产》编辑部和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向来有着很好的合作关系。这次，两家单位决定以学术研讨会的方式来纪念这位德高望众的学者，表达了我们宣传和发扬老一代学者的道德思想、学术理念的共同心愿。薪尽火传，学术之炬生生不息，学术之境日新月异。值此新的世纪，我们坚信，在继承前辈学术精华的基础上，我们的文学研究事业必将日益光大，并培育出更加坚实和丰沛的大家气象和大国风范。在这里，我谨代表文学研究所对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大力支持和不懈努力，表示真诚的感谢；对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表示由衷的敬意。

最后，我预祝大会圆满成功。谢谢。

- (081) 鲜于枢 鲜于枢言《集贤堂》明初诗言
(005) 基理歌 戴如木学内对蜂商直曹
(005) 批理歌 受想点三



目 录

- (015) 钱 潮 钱玄吹
(055) 井河来 树要重内土学林史学文古主武商直曹
(045) 王 禹 元白古内内唐里木学主武商直曹
- “中古诗学暨曹道衡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致辞 杨 义
- 文学史有限论 徐公持 (1)
- 《诗·秦风》五篇诗旨与作时补证 邵炳军 (25)
- 汉四家诗外的诗学考索 刘毓庆 (37)
- 汉魏两晋四言诗的新变和体式的重构 葛晓音 (51)
- 乐府古辞《石留曲》试解 徐振贵 (74)
- 杂赋与乐府诗的关系 伏俊琰 (80)
- 清商曲辞艺术特点形成考论 刘怀荣 (88)
- 北京图书馆藏敦煌新 1543 号《文选·辨亡论》写卷校证——
..... 罗国威 (104)
- 谢灵运的佛教撰述考 高华平 (117)
- 《调四声谱》小考 卢盛江 (138)
- 文之有选，自萧统始
——从《隋志》看《文选》与前代总集编辑方式的不同
..... 胡大雷 (148)
- 元代诗人的学陶现象及其对陶渊明诗歌“真境”美的阐发
..... 李剑锋 (156)
- 《兰亭集序》与后代讌集序
——兼评侯方域《阳羨讌集序》的抒情特色
..... 曹 虹 (178)

宫体诗和《花间集》语言之比较	汪红艳 (186)
曹道衡教授的学术成就	邓绍基 (200)
三点感受	刘跃进 (207)
在传统与时代的交接点上	

——曹道衡先生古代文学研究述评

..... 刘运好 陈 玲 (210)	
曹道衡先生在文学史料学上的重要建树	张可礼 (232)
曹道衡先生学术思想的两点启示	卢盛江 (243)
读曹道衡先生《中古文学史论文集》	
(1)——兼论古代文学的研究方法	王 玫 (250)
追思曹文铨先生(古风一首)	徐公持 (258)
悼曹道衡师	毛 庆 (260)
附录	(265)
曹道衡先生论著目录	刘跃进 张 剑 (265)
中古文学领域的开拓者	

——试述曹道衡先生的学术历程及其成就 ··· 刘跃进 (286)

缅怀先贤业绩，共襄学术繁荣

(117)——“中古诗学暨曹道衡先生学术思想研讨会”述要	
(138)	李建栋 (298)

(841) 雷大陆	
(851) 魏 曹	

文学史无限论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徐公持

内容提要：“文学史无限论”，对于拓展我们文学史研究的空间，发展文学史研究的范式，可以起到很大的启迪和促进作用。但是这个命题还存在一个“反命题”，即“文学史有限论”。正反两个命题实际上是一枚硬币的两面，它们构成关于文学史的“可能性”的完整表述。文学史的有限性，存在于文学史研究和编写的所有环节。重视文学史的有限性，对于提升文学史研究和编写的水准，建立和完善文学史研究的范式，使学科得到健康发展，同样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文学史观念”、“文学史材料”、“文学史体式”、“文学史研究者的学识”等四个方面，论证了“文学史有限论”的基本内涵及其表现形态。

关键词：文学史有限论 观念 材料 体式 学识

一、问题的提起

董乃斌先生在2003年武汉大学“文学遗产论坛”上，曾提出“文学史无限论”：

“本文所说具有无限性的文学史，包括但不止于成品形式是《某某文学史》的那种研究和著述，而是更广泛地指文学研究中的一个范畴。同时，也指文学研究的

一种理路一种方法，即把一切文学现象，从人到人的活

动，到这活动的种种产物，都看作是一条长河中的朵朵浪花，对其中任何一朵浪花进行研究，都必须运用历史的眼光。所谓无限，则说的是这种研究范围的广阔无垠和成品样式的极其多样、没有穷尽。本文从各方面论证了文学史的无限性之后，把问题提升到范式的高度，指出文学史样式的繁荣必将导致范式的更新和发展。^①

其基本思想是作为一种文学研究范畴的文学史，有着极其丰富的可能性，来对文学发展的“一条长河”，作出“广阔无垠”和“极其多样”的描述，它的可能性“没有穷尽”。今天我们的文学史研究和著述，虽然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和繁荣度，但距离这种“无限性”还很遥远，文学史研究和著述，还有很大幅度（接近于无限）提升工作品质的空间。所以对于文学史工作者而言，还要付出更多的努力，朝着这种“无限性”不断前进。我赞同董先生的思路，认为他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命题。这个命题，对于拓展我们文学史研究的空间，激励我们向未知领域不断求索的勇气，发展文学史研究的范式，可以起到很大的启迪和促进作用。不过我同时认为，文学史有限性的存在，也是毋庸置疑的，它存在于文学史研究和编写的所有环节之中。重视文学史的有限性，对于我们提升文学史研究和编写的水准，建立和完善文学史研究的范式，使学科得到健康发展，同样具有重要意义。我认为，文学史的无限性与有限性，构成有关文学史的可能性的完整表述，亦即这是一枚硬币的两面。所以我在这里所说的意思，既是在董先生文章启发下生成的，也是对董先生文章的补充。实际上自董先生甫发表他的论点之际，即有学者（韩经太先生）提出，“我以为不妨在考虑‘无限性’的同时，适当考虑一下‘有限性’问

① 《文学遗产》，2003年第6期。

题。”“‘无限性’主要是一个应然概念，而‘有限性’则带一点实然性。至少，我们也可以兼顾到‘无限’与‘有限’的辩证关系。”^①不过我自己对于能否处理好这一层“辩证关系”，实在没有把握，只是想从文学史“有限性”的角度，谨陈述一点粗浅理解，与各位同好共同思考交流，意在与“无限性”形成有机的组合，以深入探讨关于“文学史的可能性”这样一个大命题。

二、文学史观念的有限性

这是“文学史有限论”能够成立的第一个原因。文学史观是文学史学的灵魂。人的思想观念是无限自由的，其向度和空间无限广大，所谓“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是也。但是人的思想观念也是有限的，因为它受制于时代、地域、民族，及相关个人的思维类型和能力的限制。思想也要有一定的物质依凭，方能自由飞翔。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的原理，在此仍然适用；而“海”并非无限“阔”，“天”也并非无限“高”。另外，思想也要有一定的社会体制依凭，例如进化论观念的提出，有待消除神学迷信的社会环境。思想观念本身还具有历史性特征，原始时代人的思维，当然达不到文明期的高度；刘勰的思想在那个时代里堪称“博大精深”，但他当然不可能具备今天的“科学的”“人文的”系统观念。文学史观念就是经由千百年来许多学者的创造性劳动，与时俱进，“层累地堆积”起来，方才达到了今天的高度。至于今天的文学史观念，我们也不能说就是最进步、最发达、最完善的了，它肯定还有巨大的发展前景，因为我们受制于现实的社会和文化环境，以及本身的思维能力，不可能达致终极境界。

① 《文学遗产》，2003年第6期。

我们可以回顾近三十年来的文学史观念演变历程，来说明此点。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当时古典文学界批判“四人帮”“影射手法”等“极左思潮”，恢复“二为”纲领（“文艺为社会主义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从社会倾向言，这是一种进步，以故当时名之曰“拨乱反正”；但就思想性质言，二者具有同一性，其本质都是从阶级斗争论出发的政治实用主义。至80年代中、后期，文学史研究领域又流行“美学的”、“心理学的”、“文化学的”、“比较文学的”研究，同时“新三论”等新的研究方式也一时涌现，我们当时名之曰“新观念”、“新方法”、“多角度、多学科的交叉研究”，以为学科从此将迎来一场大的革新，学科的体质将由此获得极大提升。但今天回顾起来，无论是“心理学”的、“文化学”的还是“新三论”的观念或方法，实际上都是以其他人文学科和自然科学中的观念和方法，来渗透和置换作为人文学科的文学史自身的观念和方法。而在现代学术研究中，每一个学科都有自身的完整的体系，首先是学科性质，与学科性质相匹配的学科观念和学科方法，都应当有严格的规定性。学科体系之间可以互相渗透、互相融合，甚至产生新的学科，但既存的学科体系必须是严整有序的，亦即是“规范”的。文学史研究或曰“文学史学”，本身既是一门相对独立的学科，它就应当有属于本学科的观念理论和方法体系，所以，那些“心理学”“文化学”之类，与文学研究虽然是相邻学科，观念和方法不妨互相利用、互相渗透、互相补充，实行“交叉研究”，这样做对发展本学科有利；但无论如何，“交叉研究”不能取代本学科的观念和方法，每一门学科都不可能不主要运用本学科的观念和方法来从事研究工作。所以“从心理学的视角来研究文学史”等等，并非不可以，但对于文学史研究而言，这样做只不过是提供了重要的视角和方法上的补充，绝不当成为文学史研究的主体。文学史研究根本上还应当运用文学史的方法。我赞成在观念

和方法上都应当“回归文学本体”。就如有的论者所云：

这一切的要点，都在于回到文学文本，回到文学的内在品质中。这并不只是建立现当代文学学科研究规范的需要，而且也是摆脱那些虚假的信念，回到我们更真切的心灵的需要。也许多少年之后，我们会意识到，在历史上的这个时期，保持一种阅读态度、一种情感经验、一种审美感悟，也像保持某个濒临灭绝的物种一样重要。^①

不能设想一个独立的学科，需要以其他学科的方法来充当主力；如果文学史真的需要借用其他学科的方法，而缺乏与自身相匹配的基本方法，那么这个学科的成熟度或生命力本身也就成了问题。这正如自然科学研究虽然可以借助艺术的想象力，但本格的研究，还是必须运用严密的科学的方法。从学理方面说，必然是这样的。

所以回顾八九十年代在观念和方法上的革新努力，有推进我们学科的良好动机，也提出了一些正确的主张，丰富了学科的研究范式，正面的作用是明显的。但舍本逐末的偏颇也不可否认，文学本位的立场没有牢固树立起来，表现出了一定的焦虑甚至浮躁情绪。再说这些文学之外的其他学科的方法被引入文学史研究领域，实际上我们的前辈已经尝试过了，以心理学方法的引入为例，姜亮夫先生早在 30 年代初即已经阐述了“心理学观的文学”，主张研究“文学起源的心理学观”“文学要质的心理学观”等等问题，^② 朱光潜先生在 40 年代也已经发表了他的名著《文艺

① 陈晓明：《绝望地回到文学本身——关于重建现当代文学研究规范思考》，《南方文坛》，2003 年第 1 期。

② 姜亮夫：《文学概论讲述》，北新书局 1931 年版。

心理学》。所以在80年代，我们所做的某些观念领域的革新，实际上也并未突破时代的限制和可能，这也是毫无疑问的。

到90年代末，一些文学史研究者经过冷静思考，在观念问题上重新确立自己的立场。他们并未全盘否定80年代以来出现的一些新观念和新方法，而且显然吸收了其中不少正确的成分，但加以融会贯通、斟酌折衷，然后按照自己的理解提出了文学史研究观念方面的见解。我将这种在上世纪末重新确立立场的做法称之为“复位”，但这种复位不是回复到五六十年代，而是在进二步基础上的退一步，是一种“调整”。如：

把文学当成文学来研究，文学史著作应立足于文学本位，重视文学之所以成为文学并具有艺术感染力的特点及其审美价值。……

从某种意义上说，文学史属于史学的范畴，撰写文学史应当具有史学的思维方式。文学史著作既然是“史”，就要突破过去那种按照时代顺序将一个个作家作品论简单地排列在一起的模式，应当注意“史”的脉络，清晰地描述出承传流变的过程。……

我们不但排斥而且十分注意文学史与其他相关学科的交叉研究，从广阔的文化学视角考察文学。……^①

这里的表述是比较周到的，既重视了“史学的思维方式”，又“十分注意”多学科的“交叉研究”，但是它最强调的是“文学本位”，以此为根本立足点。与此前的若干激进主张和提法相比，它在“趋新”色彩上归于平淡，但是显然避免了偏颇，同时又吸

① 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总绪论》，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4、5页。

收了时代进步的元素，体现了一种观念和方法论上的温和理性倾向，同时也体现了文学史观念领域扎扎实实的前进步伐。

在观念形态问题上，目前对于我们古代文学工作来说面临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此即当前有许多理论问题正在探讨，如中国古代社会的性质问题，历史前进的动力问题，古代社会的阶级构成问题，农民战争的性质和作用问题，中国有无“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等等。这些问题在思想界、史学界备受关注。对于古代文学研究而言，这些问题都具有根本性意义，一旦有重要成果出现，对我们学科的影响是极为巨大的、根本性的。当然由于各种主客观条件的制约，今天在这些问题上尚未获得决定性的明显进展，有些问题正在深入探讨中，有些问题甚至只是刚刚提出，短期内难有大家信服接受的结论，但是就我本人极其迟钝的理论感觉说，我认为某些长久通行的重要观念，实在是到了非变更或者修正而不可的地步了，例如关于“封建社会”之说。对此早就有眼光敏锐者指出：

认为中国自周秦以来一直是封建社会，……就名称本身来说，这是极可笑的。因为它把“中央集权”、“专制”和“封建”搞在一起，真正是在调和无可调和的矛盾。^①

五十多年前受教育的人都知道秦始皇废封建，立郡县以后就不再是封建社会了。胡适就说过“五四”不是反封建的，因为封建在两千年前就不存在了。你看鲁迅的书，你要找他“反封建”的字样，也是找不到的。这是那时全中国人的常识……^②

① 顾准：《历史讨论》，《顾准文存·顾准笔记》，中国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21页。

② 李慎之：《新世纪，老任务——李慎之访谈录》，《书屋》2001年第1期。

基本的问题在于将中国古代秦汉以下长期实行的中央集权社会体制、专制体制，与本质上是“非”中央集权的封建制，混同起来了。我们不能不承认，这里的确存在“极可笑”的理论思维大误区，而我们今天许多人在许多场合竟仍在沿用它。又例如“阶级斗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论，它到底正确到什么程度？我们在现实政策中已经舍弃“以阶级斗争为纲”，那么在历史领域是否应当对这样一条曾经的基本观念作适当的修正？我们看到近年新编写出版的多数文学史著作，对这个基本观念已经普遍采取了“弱化”的措施，阶级斗争理论已经明显不再用来作为文学发展的一条“纲”，而是将它作为一种相关文学史实的背景性说明来处理；而有的文学史更迈出了较大的步子，已经基本上放弃了这一理论观念。再如“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此问题早在上世纪30年代即有讨论，40年代因有领袖出面表态，遂达致统一的观点。然而问题本身的复杂性，不是这样简单可以解决的，而且说实话，以往许多人对“资本主义”的理解，都流于表面化。什么是“资本主义”？它的“萌芽”需要怎样的历史条件和社会文化环境？这些论者都不甚了了，它们作出的结论自然也就难切实际。对此亦早有人指出：

“中国那些侈谈什么中国也可以从内部自然成长出资本主义的人们，忘掉资本主义并不纯粹是一种经济现象，它也是一种法权体系。法权体系是上层建筑。并不只有经济基础才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也决定，什么样的经济结构能够生长出来或不能够生长出来。资本主义是从希腊罗马文明中产生出来的，印度、中国、波斯、阿拉伯、东正教文明都没有产生出来资本主义，这并不是偶然的。……^①

① 顾准：《关于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的笔记》，《顾准文存·顾准文稿》，中国

青年出版社2002年版，第335页。